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華學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25 周年精選叢書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華學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 華學誠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25 週年精選叢書)

ISBN 978-7-208-12362-2

I. ①周… II. ①華… III. ①漢語方言—語言史—研究—古代 IV. ①H17-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23474 號

責任編輯 薛 羽

•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25 週年精選叢書 •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華學誠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1000 1/16 印張 27.25 插頁 6 字數 404,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63-2/H.75

定價 68.00 元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25 週年精選叢書

編委會

主 任 李 琪

副主任 沈國明

委 員 (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爲松 王興康 王國平 叢樹海 李友梅

陳 昕 陳克宏 季桂保 張民選 何勤華

林尚立 童世駿 潘世偉

總序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徐 麟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成立至今已有 25 年了。今天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的這套叢書，是基金 25 年來資助出版的 700 餘部學術著作中的精華，集中反映了上海學術著作出版資助工作 25 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上海哲學社會科學 25 年來的發展歷程。

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成立於 1989 年，旨在緩解當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出版難，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人才流失的問題。基金對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和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給予出版資助。1998 年起，為了支持和鼓勵青年理論社科人才的成長，又設立博士文庫出版資助系列，對優秀博士論文給予出版資助。至此，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博士文庫三大出版資助系列。

在 25 年的發展歷程中，基金資助出版了一大批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引導、鼓勵和扶持廣大理論社科工作者投身馬克思主義研究，對培養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25 年間，基金還資助出版了一大批聚焦我國和上海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重大現實問題的論著，為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同時，基金還資助出版了一批基礎性較強、具有文化積累和學術

積澱價值的專著，對於學術的傳承、文化的延續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25年來，出版資助工作團結和凝聚起了一大批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力促進了上海理論社科隊伍建設，有效提升了上海理論社科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申請資助者中，既有耄耋之年的學界泰斗，也有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中堅力量，更有與改革開放同年齡的青年翹楚。此外，一批又一批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出版資助的書稿推薦及評審工作，對這項工作給予了極大支持和高度認可。可以說，經過25年的發展和積澱，出版資助已成為團結凝聚上海理論工作者、培育上海學術共同體的重要平臺。

此次匯編出版25週年精選叢書，既是對基金成立25週年的紀念，也是對25年來資助出版著作的一次巡禮。更為重要的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面向未來、開拓創新、更上層樓，使這一傳統學術品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發揮對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導向作用、服務作用和促進作用。哲學社會科學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叢書的出版，在展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輩學人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同時，激勵後來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創作出更多代表上海學術水準、體現上海學人風采的傳世力作，為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乃至我國國家軟實力的增強添磚加瓦、貢獻力量。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的同時，強調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國改革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作出解釋和回答。這是時代對哲學社會科學提出的新要求、賦予的新使命。哲學社會科學界能否承擔起這一光榮使命，積極推動學術觀點創新、學科體系創新和科研方法創新，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體系，不僅關係到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也關係到兩個“百年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希望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能在以往25年所奠定的良

好基礎之上，繼續引導和支持廣大理論工作者，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對我國改革發展過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研究，推出一批既有重要學術價值、又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學術成果，為上海加快推進“四個率先”、加快建設“四個中心”服務，為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

是為序。

2014年6月

窮盡式研究方法應當大加提倡

——序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魯國堯

人老了，遠事記憶好，近事記憶差，這是醫學雜誌上的話，也的確如此。1955年秋天，我當時是大一學生，周祖謨先生教我們現代漢語語音課，在一次課上，他以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引用了兩句名言：“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周先生講話時的神情和那瀏亮的聲音如今依然在我的耳目之前。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八個字，就在下課的時候走上前去問周先生，這才知道是章太炎先生的話。

“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四十多年來我經常體味這兩句話，我認為，這兩句話至少是概括了整個學術史。太炎先生的話是真理。

如今放在我的書桌上的這本《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我以為是應了太炎先生的“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八個字。這部書稿是華學誠同志的博士論文，現已獲准列入“第四批上海社會科學博士文庫”，並得到全額資助出版。學誠同志要我為他的專著作序，是因為我曾忝為他的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或許也因為我剛剛在《方言》雜誌今年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通泰方言研究史臚述》，他以為我對方言研究史有些瞭解。是的，我也曾經看過這方面的若干資料，在這些資料裏能稱得上漢語方言研究史的文字並不多，這個專門學術史也祇是到了二十世紀才真正開始建立，羅常培先生的《漢語方音研究小史》和何耿鏞先生的《漢語方言研究小史》是開創性的著作，“筚路藍縷，以啓山林”，功昭學史，至今仍是有價值的

論著，仍是這一學科的學人必讀之作。但是惟其是草創之著，必有簡略之憾，這也就給後繼者留有廣闊的空間，讓他們馳騁，使英雄不嫌無用武之地。

如果說羅、何等先生的論著是“前修未密”，那麼學誠這本書就是“後出轉精”。其“轉精”倒不主要是因為華著厚達數百頁，三十多萬字。說實在的，如今的書，幾乎無一不厚，可是很多書水分太多，就像一條剛剛從臉盆裏提起來的毛巾，這樣的書是絕對和“精”字不搭界的。

學誠的書，顧名思義，是研究自先秦至兩晉的方言研究史的，它就得囊括這一長時間內的有關方言記載、研究的各種史料，予以甄別、熔煉、分析，作出論斷，前人的觀點正確者闡發之，錯誤者駁正之，不足者補充之，還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見，這新見還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見，就更難能可貴了，如此，這方才叫“轉精”。下面舉些例子來說。

郭璞的《方言注》是一部了不起的書，後世學者對它都很重視。王國維先生在《書郭注方言後》的一、二兩篇中發凡起例（見《觀堂集林》卷五），周祖謨先生對郭氏解釋詞語的一些重要條例也曾作過概括（見《方言校箋自序》）。但是王、周兩位先生都因未窮盡材料而難免疏漏。學誠同志則對《方言注》的全部材料進行了研究，從而在王、周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又補充了二十條，其中音注類條例 9 條，釋義類條例 8 條，缺如類條例 3 條，同時還訂正了王國維漢晉之語音相近而有微別者先注正文音，後在今語下注今語音的說法（見本書第 367—376 頁）。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都認為《釋名》代表青徐方音，因而研究古齊魯方言的專家常常拿《釋名》中的材料來作例證，學誠同志則質疑這一成說。其實《釋名》一書收有一千五百多條詞語，稱引有明確地域名稱的方言材料只有 40 條，也就是說，全書 97.4% 的詞語都可不視為方言詞；書中方言地名共出現 47 次，其中青徐一帶的地名出現 28 次，可見明確稱引的方言材料也不專屬於青徐；劉熙著書的目的既然是探索百姓日稱詞語的“所以之意”，也就不會拋開通語雅言而祇從他的家鄉話中去尋求得名之由。學誠同志主要根據上述分析得出結論：“《釋名》從總體上來說是一部以東漢通語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它不是‘代表青徐方音’的書。”（第 190

頁)這一新說就把學誠帶進了爭鳴的行列。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句，何休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阮元的校勘記認爲“登讀言得來”中誤衍“來”字。學誠同志細緻體會《公羊傳》原文和何注，採信了阮元的校勘意見，認爲何氏所記齊語是指“得”讀同“登”音，並據此進行古音分析，而懷疑“‘登讀言得來’正是帶[l]的複輔音”的說法(第259頁)。

羅常培先生曾指出，《方言》裏所用的文字有好些祇有標音作用，並舉出三種情況來證明，其中第三種情況就是揚雄自己所造的字，所舉例字是訓愛的“慘”、訓哀的“悽”和訓好的“姪”(見《方言校箋羅序》)。這三個字都見於《方言》卷一，我們注意到學誠同志考證《方言》奇字所列的296字中就沒有“悽”字。這是因爲在《方言》之前的文獻中已見該字的用例，比如成書早於《方言》一百五十多年的《淮南子》一書的《兵略》篇中就有這樣一句：“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悽沮膽其處。”羅先生於此偶疏詳審，學誠同志沒有依從是因爲他已掌握了可以信據的材料。

學誠同志的書可稱道的地方很多，如揚雄“奇字”問題，是史實，也是學術史上的佳話，也是詩詞中的典故，學誠同志闢專章縷述，娓娓道來，令人稱快。我在這裏再着重講一條，就是他的窮盡式的研究方法。我第二遍讀他的書稿時，有意識地將若干數據摘出抄下，請看：

《爾雅》中出現方言詞的條目有131條，“《爾雅》中的方言詞，通過比較《爾雅》稍後出現的著作以及漢晉注疏資料和出土文獻，共考出211個。”(第43頁)其中單純詞195個，合成詞16個(第45頁)。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該書中的《爾雅》方言詞在漢代12個方言區中的分佈情況統計表，如我感興趣的吳越方言區就有27個方言詞。(第57頁)

揚雄《方言》共記載了1284個詞，其中單音節詞979個，複音詞305個(第123頁)。《方言》中的“奇字”被學誠考得296個(第144頁)，最後推定包含有揚雄所造之字的字量爲132個(第153頁)。

劉熙《釋名》中有明確方言地域的材料共40條(第186—188頁)，涉及地名19個，共出現47次，其中青徐一帶28次，兗冀一帶8次，荆豫一

帶 7 次，其他地區 4 次（第 189 頁）。

許慎《說文》涉及地名 73 個，共出現 194 次（第 219—220 頁）；其中楚語 50 餘次，秦語 45 次，齊語 33 次，周語 20 次，汝南話 17 次，等等（第 220 頁）。

王逸《楚辭章句》涉及方言詞的有 22 條，其中 2 條為秦方言詞，餘為楚方言詞（第 240 頁）；楚地特有詞 14 個（第 242 頁），楚語音變詞 6 個（第 245 頁）。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引方言詞 30 條，其中齊魯方言詞 26 個（第 249 頁）；屬於詞彙內容的有 21 條，共 23 個詞，其中名詞 10 個，動詞 10 個，形容詞 2 個，副詞 1 個（第 251 頁）；涉及方音的材料 2 條（第 259 頁），涉及方言語法的材料 3 條（第 260 頁），按，後者很重要，因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方言語法的材料罕見。

東漢末大儒鄭玄遍注群經，從現存的鄭玄三禮注和毛詩箋及其他輯佚書中，可得其方言詞 67 條，涉及地名三十多個（第 264 頁）；其中標有“今”字的材料 19 條（第 264 頁）；齊魯一帶的詞彙 24 條，方音材料 18 條（第 267 頁）；楚越一帶的詞彙 7 條，方音材料 7 條（第 276 頁）；周秦一帶的詞彙 4 條，方音材料 7 條（第 279 頁）；燕冀一帶的詞彙 3 條，方音材料 5 條（第 281 頁）。

高誘《呂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中的方言材料共涉及 25 個地名，這些地名共出現 84 次（第 287 頁）。其中楚淮方言詞 20 條，方音材料 13 條（第 288 頁）；幽冀方言詞 10 個（第 294—295 頁），方音材料 7 條（第 296—297 頁）；青兗方言詞 9 個（第 297—298 頁），方音材料 3 條（第 299—300 頁）；周秦方言詞 10 個（第 300 頁）。

從輯本中獲得的三國時期的方言材料 50 餘條，其中漢語方言地名共出現 54 次，各地區地名出現的數量比為：西南地區 5.6%，長江以南 20.4%，長江以北 74%（第 307 頁）。

從輯本中獲得的兩晉時期的方言材料 45 條，其中漢語方言地名共出現 52 次，它們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長江以北地區的地名出現 19 次，佔 36.5%，長江以南地區的地名出現 31 次，佔 60%（第 314 頁）。

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在 51 條當中引方言 80 次(第 320 頁),其中幽州地區 23 次,青徐兗地區 18 次,豫冀地區 12 次,荆揚地區 12 次,關西益州地區 9 次,其他地區 6 次(第 326 頁)。

郭璞《穆天子傳注》中的方言材料有 5 條,《山海經注》中的方言材料有 9 條(第 331—332 頁);《爾雅注》中引《方言》材料 19 條(第 333—334 頁),引晉代方言 157 條(第 334—341 頁);《方言注》中引晉代方言 93 條(第 343—348 頁)。上列四書中共引晉代方言 264 條;其中江東地區的地名出現了 173 次,佔 65.28%;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22 次,佔 8.3%;西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31 次,佔 11.7%;中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15 次,佔 5.6%;東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17 次,佔 6.4%;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7 次,佔 2.64%(第 348—350 頁)。把江東地區和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次數加在一起有 195 次,佔 73.59%(第 350 頁)。郭璞所引晉代方言材料中共有 271 個詞語,其中單音詞 152 個,佔 56.09%,複音詞 119 個,佔 43.91%(第 361 頁)。複音詞中有 5 個三音節的,1 個四音節的(第 362 頁);其他 113 個雙音節的詞,單純詞佔 31.86%;合成詞中偏正結構的佔 71.43%,並列結構的佔 11.69%,動賓、動補結構的佔 3.9%,附加式的佔 12.99%(第 366 頁)。

以上除了一則是概數以外,其餘都精確到個位數。

我十分贊賞學誠同志的這種窮盡式的研究法。窮盡式自然比例舉式高明,這是任何學人周知的事實,無庸論證。當然也會有些課題不能使用窮盡式,自當別論。而坊間大量學術性著作卻喜歡採用例舉式而摒棄窮盡式,為什麼?窮盡式要花大力氣,下死工夫,不是幾個月或者半年、一年能成功的。當今急功近利,無事不欲速成,怎能耐得住冷寂?忍得了煩難?讓我們來簡單地瞭解一下學誠同志研究方言研究史的歷程:他自 1986 年起開始研究揚雄《方言》,於今十有五年矣,他執著,他堅韌,他奔着一個目標。與本領域有關的論文他寫了二十多篇,共三十多萬字。有堅實的基礎才能建成大廈,以上的那些統計數字都是一件一件的建築預製件。我以為,窮盡式的研究法得出的結論、觀點,顛撲難破,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長期地存在,我相信,同意這看法的人一定不少。

我若干年前曾和一位史學界的朋友交談，這位歷史學家說，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史料是窮盡不了的，因為冷不丁會從什麼地方，或什麼收藏家那裏冒出某個史料甚或一批史料。後來我研究宋代音韻史和宋代語言學史時發現，研究宋代也難以窮盡史料。至於上古、中古，傳世文獻則是可以窮盡的。學誠同志的書是方言研究史中的斷代史，研究的時段是從先秦到兩晉，因此文獻資料自然是可以窮盡的。學誠走的是窮盡資料的路子，方向明，路子對，坐了冷板凳，下了死工夫，所以他這本著作能“後出轉精”。如果學誠不採用窮盡式的研究法呢？今年前些時候，報紙上有兩個熱點，都是關於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甚鉅的張學良將軍的，一是他的一百零一歲誕辰的慶祝活動，一是隨後不久張將軍逝世的消息。為這兩件事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其中有一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其言深刻。歷史學者唐德剛對張學良講：“您如果不發動西安事變，您就什麼也不是，一個軍閥而已。”我模仿唐先生的話說：“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華學誠出版研究先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的著作，如果不採用窮盡法，就什麼也不是。”只有採用了窮盡法，他才有可能跟“後出轉精”四個字對上號。

華學誠同志研究先秦至兩晉的方言研究史，努力窮盡了傳世文獻。我還注意到他也曾利用過出土資料，書中有兩處這樣的例證：一是考證《爾雅》中的方言詞時，他利用了楚和秦的簡帛文字（第40—41頁）；一是考證《方言》中的“奇字”時，他使用了甲、金、簡、印、碑刻等文字（第146—148頁）。這是值得嘉許的。我想向學誠同志提一條建議，如今地不愛寶，大量出土資料不斷涌現，譬如近年刊佈的竹簡材料主要有：尹灣漢簡（1997）、郭店楚簡（1998）、九店楚簡（2000）、周家臺秦簡（2001）、三國吳簡（2001）。本月12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卷出版首發式隆重舉行，取得轟動效應，這批竹簡共一千兩百餘枚，辨識文字三萬五千多個。近若干年發現的大批簡帛中有没有方言資料？這就需要進一步探究，我希望學誠同志繼續追求，使這本書真正窮盡了現時所有的相關資料。當然一本書的成功不是僅僅靠最大限度地佔有資料，同時也得在學術的深度和廣度上肯下功夫。

未了兒，但不是不重要的，至少我以為。由對學誠同志的這本著作的議論我想推拓開去談論兩種研究方法的問題，當然也與學風問題不無關係。我經常注意觀察學術歷史和學術動態，似乎這半個世紀在漢語的研究方面，學界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根據一個、幾個或稍多的個案，在某個理論框架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繹，導出一兩個甚或一系列的帶有前瞻性的提法，高者更能提出某種理論。另一種研究法則是擁有豐富的高誠信度的語言或方言資源，爬羅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甚至使用窮盡的方法，歸納之，分析之，既然立足於紮實的基礎，得出的結論則堅而難拔。當然這種兩分法是就其大體而言，並非壁壘分明，有些專家能兼而具之，是之謂大家。我以為，半個世紀以來，形成了這兩種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學術“生態環境”造成的，學人既然走做學問的道路，怎能不努力適應各自的環境？“適者生存”嘛！因而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究其實，這兩種研究法都是各揚其長，這話說了，討人歡喜；但是我也要說，這同時是各避其短，也許少數學人聽了不高興。似乎存在着這樣的現象，當然是個別的：此把彼看作鄉下土包子，採取俯視的態度；而彼則視此為西門大官人的花拳繡腿，算不得過硬工夫。平心而論，人世間沒有沒有缺點的事物，兩種研究法，兩類學者，各有其長，各有其短，借用當前報章上的用語說，是“互補性很強”。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兼容並包，彼此平視對方，不應該俯視，也不要仰視，應該提倡“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由接觸，而溝通，而互敬，而交流，而合作，而整合，以達於交融，我以為這是我們應由而且必由的康衢大道。

以上所言，是耶？非耶？請學誠和諸同道評論。

好了，就此打住。

2001年12月29日夜於隨園北鄰

序

胡奇光

搞學術的青年常做創新的夢。要把這創新的夢變成活生生的現實，需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勞動。這個道理，似乎人人皆知，卻非人人都辦得到。而華學誠君，是做到了，有他的著作《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為證。

方言研究史是語言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依照傳統的看法，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着重敘述文字、音韻、訓詁等學科發展的歷史，而方言研究史原為訓詁學史的一個分支，因此，幾乎所有中國語言學史的著作都對方言研究頗為重視，可又難講詳盡。敘述方言研究史的難點在古代。而一到了現當代，那敘述的格局就改觀了：方言調查與研究，不僅成為語言學園地上的一門“顯學”，而且從世界語言研究看，它還是我國的一門可與古文字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並列的優勢學科（王力《我對語言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隨着我國方言調查與研究的蓬勃發展，一個關於中國古代方言研究史的撰寫任務，便落在一位富有學術敏感的青年的身上。華君早在1990年撰成的“歷代《方言》注家述評”（為劉君惠等《揚雄方言研究》一書第三編），就已經勾勒出我國古代方言研究的大體輪廓。從1990年到《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的定稿，他足足奮鬥了十一個春秋。真可說是“十年辛苦不尋常”哪！

這部著作確實“不尋常”，從史料的拓寬、方法的革新，或立論的創造上看，這部著作都頗有新意。在目前研究古代方言及其歷史的有關論著

中，當以這部著作最好。好就好在率先詳盡地原原本本地敘述了從三代至魏晉期間方言研究的發展歷史。如果說漢語古代方言學史可分上、下編，那麼，這部著作其實就是漢語古代方言學史的上編了。我們期望作者繼續保持那種“韌性戰鬥”的精神，再接再厲，去完成更為難寫的下編，好讓人們對漢語古代方言研究的歷程，有一個全面的完整的認識，以之作爲當今方言研究的歷史借鑒。

2001年12月26日於復旦大學